

陶渊明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以新井白石《陶情诗集》为例

■李莹

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作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备受日本文人追捧。受陶诗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儒学者新井白石就曾作《陶情诗集》这部汉诗集,他模仿陶渊明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重视交友诗的传世手法,并借史言志。但是白石不是简单地模仿陶诗风格,而是想通过诗表“陶情”。他对陶诗接受,不仅是出于对汉学的喜爱,更是源于他与陶渊明相通的特质,“归隐和出仕”的经历、“儒学”的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提及新井白石对陶诗的接受,这一研究将丰富对新井白石的整体认知以及侧观陶诗在日本的影响力。

[关键词]陶渊明;《陶情诗集》;新井白石

[中图分类号]I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10-0111-06

李莹,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

(广东广州 510006)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汉学东传日本,对日本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其中,中国诗人陶渊明(365—427),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是东晋末期到南朝宋初期文学家,他的诗作传播到日本后深受日本文人的追捧和模仿。国内对陶渊明的研究热情也一直没有消退过,或说其为“隐逸诗人”;或说其为“政治诗人”,他的思想,是儒,是道,是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陶渊明不仅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化史,特别是在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文化史也影响巨大。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者、历史家、政治家、诗人新井白石(1657—1725)在其年轻时期就曾著有《陶情诗集》。

白石是号,真名君美,年轻时期并没有跟随有名老师,而是独自学习为主。宫崎道生指出:新井白石第一是诗人;其次是学者;第三是政治

家(经世家)。^[1]事实上,国内外的研究者对白石的政、历史、儒学等方面研究成果颇多,但对他的诗作研究明显较少,而中国学者的成果更是屈指可数。

据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记载,他从小受到母亲的良好家庭教育,17岁接触到了大儒中江藤树(1608—1648)的《翁问答》,迸发出异常的求知欲望,之后还阅读了《四书》《五经》,有着非常深厚的汉学基础。宫崎道生指出:“21岁的白石已经非常熟识日本历史,关于和歌、文学书等古典也具有丰富的知识。”^{[2](P136)}关于《陶情诗集》,宫崎道生从他诗集末尾所署“延宝壬戌秋白石旧隐新井耕父稿”这几个字分析,虽然“壬戌”指天和二年(1682年,白石26岁)秋编撰了诗集,但是冠上“延宝”的年号具有某种意义。而且,“旧隐”和“耕父”二词也是别有用意。“隐”字

可以解释为隐于市井或田园,“耕父”指农夫,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他装作隐遁者的笔名。就在当年3月份,白石即将出仕为堀田正俊服务,他把自己作为浪人的那段时间称为“旧隐”,而这部诗集收录的作品全部都是那段时间所作,所以他用了“延宝壬戌”这样矛盾的作诗时间。^{[2](P137)}汉学东传,在当时的日本,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对文人们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小尾郊一认为:“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的模范备受仰慕。他的诗、他的生活、他的思维方式给后世莫大的影响。说到隐遁,后世很难想出有超越陶渊明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归属于渊明的系统内。”^{[3](P10-11)}

虽然日本学者石川忠久认为这部诗集的诗风接近晚唐、宋诗风格,没直接提及白石受陶渊明影响,但他赞同宫崎上面所分析的情况,认为“旧隐”、“耕父”是别有用意,《陶情诗集》正是白石浪人状态下所做的诗集。^{[4](P72-74)}所以“陶情”,重点应该在于突出似陶之情,而非简单地模仿陶诗。为此,本文拟以《陶情诗集》为考察文本,试图从传意风格、创作意境及作者的从仕从文生活体验等方面,研究新井白石与陶渊明的创作关联,进而揭示中国文化汉学东传的历史印记。

一、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风格模仿

《陶情诗集》是新井白石年轻时期创作的第一本诗集,虽然没有老师指导,但是体现了白石扎实的汉学功底和对汉诗的热爱。在《新井白石全集》(国书刊行会全6卷)中并没有收录这部诗集,只是在他的著作中有提及。从题材内容分类可以看出这部诗集的主要题材是风景描写,按照宫崎的归类方法,统计如下:(1)风景描写五十四题、五十六首;(2)年中行事六题、六首;(3)交友关系十六题、十六首;(4)历史关系四题、四首;(5)私生活关系十一题、十八首;合计百首。^{[2](P185)}这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风格极为相似。

陶渊明以田园诗著称,在风景描写的诗中突出物象来传意是其特色。洪林钟指出“鸟(云)-菊(松)-酒”最能体现陶渊明“向往(理想)-(抗争)现实-奋斗”的人生历程,所以陶诗中多次运

用鸟、云、菊、松、酒等题材,“陶渊明正是精心炼意取象,选用那些具有象喻性和继承性的物象,借物自况,托物咏志,在诗中淋漓尽致地书写了他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精神,展示了他的高尚品格和光辉人生”^[5]。在陶渊明的《九日闲居并序》的序中,他写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而“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这两句让人明白了“寄怀于言”所指。这首诗表面看上去似乎有消极感,但利用“酒”来“祛百虑”。“百虑”,说明陶渊明对现实的种种思索,同样以“菊”控制“颓龄”,是要争得更多时间。“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不愿意就这样白白地度过重阳节,他以“菊”的高贵品质来表达他虽然从政理想不得志,但也要继续文学创作,不愿意虚度光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正统的儒家用世精神,是一种努力进取奋斗的思想。

白石的《陶情诗集》中也有一首《十日菊》之诗:“节去蝶愁秋正衰,晓庭犹有傲霜枝。千年遗爱陶彭泽,应拟元嘉以后诗。”这首诗中十日菊指的是重阳节后一日的菊花,仍有“傲霜枝”,表明了菊花之高尚节操。“千年遗爱陶彭泽”,不仅说明了陶渊明爱菊之名声远扬,更是表明白石对他的崇拜。但是在《陶情诗集》中并没有大量描写“菊”的诗,反而更多的是“梅”的诗。诗集百首诗中有23%的诗,都和梅花有关系。其中,有十一首诗的诗题中带“梅”字:《窗前红梅已蓓蕾》《梅影》《红梅》二首、《早梅》《和山元立访予庭前红梅韵》《寻梅》《水墨梅》《梅》《梅下口号》《腊梅初开》等;而诗句内容中含“梅”字的诗句达到二十三首之多。而日本传统意识上的国花“樱花”却没有出现在诗集中。在《寻梅》诗中,白石描写梅花“绝代高标群卉上,惊人清气数花间”,这两句体现了他喜爱梅花的清新高雅;“前生自有神仙骨、到死宁为儿女颜”这两句则突出赞赏梅花的傲骨坚强。虽然“梅”非“菊”,但这和陶渊明的借物自况的手法是极其一致的,而且冬天的“梅”比秋天的“菊”更加耐寒,也暗喻了诗人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奋斗思想。

此外,白石除了中国汉诗题材外,也尝试以日本独特诗材来创作汉诗。作为日本风土的象征,富士山也被称为“神仙山”,从古就经常被日本文人歌颂。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作《土峰》就是富士山这一日本代表诗材:

忽见未知岳,杳然如望云。
倚天千仞立,拔地八州分。
晴雪粉堪画,长烟篆作文。
有时仙客到,笙鹤月中闻。

日本文人的作品少不了以富士山为题材,白石也同样。在《土峰》这首诗里描写了雄伟的富士山美景,其中第六句“长烟篆作文”,指的是富士山冒出的长烟,就像中国古代的篆形字,因为白石时代的富士山和现代不同,当时是活火山,经常喷烟。白石不满足于中国汉诗题材,尝试以日本独特诗材,套用中国风趣的表达艺术,升华至日本特色的品位中。这种向别人展示日本独特事物的自豪感,也正是新井白石汉诗的独特性与魅力所在。

二、交友诗的诗文传世手法相似

在陶渊明诗中,有很多写交友关系的诗作。《与殷晋安别并序》《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赠羊长史并序》《和刘柴桑》《答庞参军并序》等。陶渊明的人生经历特别,出仕归隐,归隐出仕,五官三休,有猛志渴望举荐之时,也有不遇迷茫徘徊之时,他把思想藏于诗中,不仅以诗会友,更是以诗传世。魏正申指出陶渊明主要借助三种方式传播诗文:“其一,请朋友书写、传抄。其二,在以文会友的探讨交流中传播。其三,通过多人参加的小型诗歌创作集会传播。”^{[6](P108-109)}如《饮酒二十首并序》的序中,“聊命故人书之”的传抄;在《移居二首》其一中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探讨交流;其二中的“农务各自归……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集会等都证明了陶渊明重视交友,并且希望诗文传世。

新井白石在这点上也努力向陶渊明学习。在《陶情诗集》中,也出现了很多交友关系的诗作。《和山元立访予庭前红梅韵》《和山秀才和菅

庙即事之韵》《中秋夜陪江氏赏月于河范亭上》《送河范入仕》《和山氏题亡妻手自栽桃花韵》《和钓月秀才韵以题其诗稿》《和松秀才弔病》《和松氏韵自述三章以呈》《寄长秀士》《奉和源知县之赐韵》《送对马州山元立从行迎朝鲜聘使于草梁》等,可以看出白石,无论是仕途之交,还是文人之交,交友广泛。尤其是最后一首《送对马州山元立从行迎朝鲜聘使于草梁》,可谓是《陶情诗集》的前言:

行尽大瀛道里千,殊方风物照楼船。
管宁旧业云山接,箕子提封烟树圆。
鹤护危巢归绝壁,龙将急雨过长天。
壮游奇观浑佳兴,诗雉鸡林到处传。

这首七言律诗,是白石送别朋友对马州的“山元立”跟随一行在草梁迎接朝鲜聘史时所作之诗。而正是这位“山元立”,即西山顺泰(本姓,阿比留),把《陶情诗集》推荐给朝鲜聘史作序,才有了后来的盛传。诗作的最后的一个“传”字表明了白石的良苦用心。所著《折焚柴记》中也有这样一段关于这部诗集的描述:

二十六岁之春,再次出任之身。今秋,朝鲜聘史来,借由阿比留,将平生收录之诗百首,以求三学士作评,定下见其人后作序一事。九月一日往客店,见制述官成琬、书记官李聃龄及裨将洪世泰等,一起和诗。是夜成琬予我诗集作序而赠。^{[7](P27)}

日本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为日朝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这些朝鲜通信使都是学识优秀之人,到日本后很受文人们的追捧和尊重;其次,幕府上层的重视,经常命令官员们为通信使举行欢迎会,两国学者进行面谈,和诗等活动。所以,白石就借这个通信使来访之机,呈上了《陶情诗集》。而朝鲜通信使看了诗集后,都不吝赞扬之语。在这部诗集序里,作为通信使的成琬评价道:“白石公日本之奇士也,自儿戏贯穿子史,驰骋翰墨,摘诗之正芭,内积既富外发方多,上而天地风云。”而负责书写跋文的洪世泰也这样赞扬白石:“余在馆中,见有《陶情集》。清新雅丽,往往有披沙拣金处,令人刮目。

真作者手也。及见其人,胜于其诗,所谓表里如一金玉君子也。”^{[2](P149)} 不仅高度评价了诗集本身,也极力称赞了白石本人。

白石诗作获得朝鲜通信使很高评价一事,一时传为佳话。以此为契机,白石也受到了木下顺庵(1621—1699)的赞赏,日后成为顺庵之弟子,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实现抱负。不仅成为德川纲丰的侍讲,还一直辅佐德川家宣和家继两代将军。功劳里面虽然有他当时的好友阿比留的一份,但是更主要的是白石自身积极地为诗文传世而付出的努力。这部诗集也可谓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此外,白石的诗集中有数首诗中,配有诗序。这和陶渊明的风格极为相似。这种诗序和诗相得益彰,不仅成为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更为诗文传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三、咏史诗的从仕从文双重理想

陶渊明的诗中除了田园诗外,还有较多的咏怀诗和咏史诗。这跟他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他不是纯粹的诗人,他有数次仕宦经历,却最终归隐田园。《咏荆轲》《咏三良》《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杂诗十二首》《感士不遇赋并序》《归去来兮辞并序》等作品,关怀社会,关心时局,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赞同,表达出对理想人格的认同。

陶渊明在《命子》中通过历述先祖功德来激励儿子将来要成为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人:“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谈及自身,在《杂诗十二首》其五有言:“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二则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见,陶渊明原本是有政治理想的志士,并不是年轻时就想做隐士。在《感士不遇赋并序》的序中,他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于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

以徒勤。”善良正直、才华横溢又有什么用?在虚伪黑暗的社会中,有大志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迫害,进退两难。这篇赋抨击了当时腐朽的社会政治与败坏的道德风尚,面对这样的现实,陶渊明最后选择的是归隐,但归隐不等于什么都不做。他只是转向了文学事业。绝笔《自祭文》中说:“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缙?挫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正体现陶渊明自己的人生追求,非名非利,而是从事文学创作。魏正申认为,陶渊明对文学创作事业的追求是从政不可得的转志,是遵照儒教用世精神的积极进取,表现了一种建立功业的强烈意识。^{[6](P103)}

而新井白石在《陶情诗集》中咏史的诗作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稻村崎》:

金鼓振天从北藩,惊沙溅血日光昏。
宝刀沉水神龙化,碧海扬尘汗马奔。
九代衣冠余站骨,千年星月照冤魂。
满江巨舰真闲事,依旧寒潮落远邨。

这首诗咏叹的是镰仓幕府末期的名将新田义贞(1301—1338),从北边的上野起兵攻北条,在稻村崎这个地方进行突袭,攻陷镰仓,北条氏一族及家臣自刃,北条政权灭亡的历史故事。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新井白石景仰新田义贞的光辉事迹与其攻陷镰仓的快举,他不仅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敬仰,也隐晦曲折地表明了自己的抱负,并不甘心于现状。

创作这部诗集时,白石还是浪人身份,所以他没有过多地描述历史,是跟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系的。他不愿意抵触统治阶级,他只是暂时不得志,还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政坛。他只能寄情于诗作,来表达他积极入世的政治追求和事业心。这种精神和少壮时期的陶渊明也极为相似。

四、白石诗集的“陶情”

除了以上田园风景诗,交友关系诗,咏怀咏史诗外,陶渊明还写有非常多的抒情诗。“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中的执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并序》之五)的恬静;“思友则披衣”(《移居二首》之二)的诚挚。而白石也在《陶情诗集》中写有不少私人生活方面的诗作。“秋风收紫栗,春雨剪青韭”(《关二野居》)的自得;“日长无一事,睡起探茶经”(《小亭》)中的坦率;“书生习气真堪咲,半夜梦中读汉书”(《病目》)中的好学。塑造了白石真诚天真自然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同时也促进了诗集传世。

白石模仿陶诗风格,并不只是单纯地出于对汉学、汉诗的喜爱,因为唐宋也有很多中国有名诗人的诗歌流传到日本,但是白石之所以选择陶诗,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文化素养和性格特征,让他找到了与陶渊明的相通之处。这一点与中国学者的文史治学精神有相通之处。^[8]

第一,白石的青年时期,是在政治动乱、社会不安定的氛围下度过的,在这个背景下有与陶渊明类似的出仕和隐退经历。《折焚柴记》中有述,白石的父亲正济是上总国(千叶县)久留里城主土屋氏的家臣。1679年,久留里藩被废除,土屋氏被改为旗本。新井白石成为大老堀田正俊的家臣。^{[7](P5)}白石原是土屋家的家臣,但由于土屋家的纷争而被迫成为浪人。直到26岁,受人推荐,再次出任,成为堀田家的家臣。《陶情诗集》正是白石被土屋家逐出成为浪人的期间里创作的。他的一时隐退和再次出仕的人生经历,从陶渊明身上找到了共通点。诗集中唯一出现的一句“千年遗爱陶彭泽”,也是说明了白石了解陶渊明做过彭泽县令,然后又辞官的经历。

第二,白石深受儒学熏陶,与陶渊明一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入世精神。白石自幼聪慧,三岁时能够用纸蒙在书上描绘其图画及汉字;六岁能背诵七言绝句的汉诗;八岁开始习字;十七岁开始诵读《四书》《五经》,开始懂得了圣人之道。^{[7](P24-26)}年轻的白石在自学中探索学问的奥妙,他的汉学基础,以及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才有了《陶情诗集》的创作。这部诗集创作的目的,兼有入仕和从文双重性。仕途不顺,转

向诗文创作。而且白石积极地把诗集呈现给朝鲜使者,并得到高度评价,也证明他有强烈的积极入世精神。这和陶渊明诗中所体现的“猛志逸四海”的心态很吻合。

第三,白石性格正直,不为金钱所动,与陶渊明一样崇尚清风亮节的高尚品德。《折焚柴记》中记载了白石在被逐出土屋家后的五年浪人生活期间,两次拒绝富商要其当养子的美意。第一次拒绝的理由是:“我不愿在我这辈舍弃父祖相传的‘弓矢之道’,去继承商人家业。”^{[7](P31)}第二次是有富商提出以黄金三千两资助他学业,并许配一女给他,他也拒绝了。理由是:“扔三千两黄金,造就一个带大伤痕的学者,不能算是策。”^{[7](P33)}白石的这种甘于贫穷,而不失大志的品德正是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相通。

只是拘泥于诗作诗风的考察,难免流于表面,需要理解更深一层的是,白石之所以选择陶诗,是因为他自身与陶渊明的经历与性格的相似。白石所处的动乱时代背景下的“归隐和出仕”经历、他的“儒学”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才是他的真正“陶情”所在。

五、结语

新井白石之《陶情诗集》汉诗的创作和研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一部日本汉诗集《怀风藻》(751)开始,学者们就没有停止过对汉诗的创作。新井白石年轻时代创作的《陶情诗集》,虽然相比他后期的诗集《白石诗草》《白石先生余稿》等,内容上比较单薄,主要围绕风景和人物关系而作,但是可以看出白石是一位热爱汉诗,向往中国文化,逐渐脱离简单模仿,提升独创性的日本文人。而且从白石的这部诗集的创作和背景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诗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甚至是朝鲜汉诗的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思想,或者说陶渊明的思想对日本思想史、文化史影响的一个侧面。

很多人说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但是陶渊

明频繁的出仕和归隐,关注历史和现实,珍视友情和亲情,他积极创作文学,展现出更多的是儒家的进取精神,不从政也可从文,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钟优民指出:“仕与隐,道路尽管不同,但中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学而优则仕的人,也具备隐而著书立说的条件。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能做官而不做的人,才具备有当隐士的资格。所以历代都有学而仕的封建文人,也有解职归田的隐逸之士。”^[9](162-63)]陶渊明正是“解职归田的隐逸之士”,“隐而著书立说”之人。

新井白石在在诗集的最后署名中,他以“旧隐新井耕父”自称,可见他认为自己“曾经”也是像陶渊明一样的“解职归田的隐逸之士”。这种隐逸并非出于对人生意义的虚无理解,而是通过写作隐晦曲折地表达对现实和人生的执着追求。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白石把诗集命名为《陶情诗集》。白石以“陶情”而著“诗集”,一方面说明了白石个人所认可的陶渊明并不是消极的“出世”,而是怀有政治不可得,转志于文学创作,积极“入世”之情。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江户时代的日本,陶渊明作为中国“隐逸”思想的代表者对

文人志士影响之巨大,而日本的文人们也在接受和模仿外来文化中,尝试日本本土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日)宫崎道生.诗人白石——新井白石补遗[J].日本历史,1990,(19).
- [2](日)宫崎道生.新井白石·折焚柴记上[M].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
- [3](日)小尾郊一.中国的隐逸思想[M].东京:中央公社论,1988.
- [4](日)石川忠久.东海之风雅[M].东京:研文出版,2007.
- [5]洪林钟.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意象建构及其人格凸现[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4).
- [6]魏正中.陶渊明评传[M].天津:天津出版社,1996.
- [7](日)新井白石.新井白石全集(第3卷)[M].东京:国书刊行会,1977.
- [8]孙少华.饶宗颐先生文史治学法管窥[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 [9]钟优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彭民权】